

突梯滑稽辜鴻銘

王成聖

辜禮歡開闢新加坡

在中英文「名言彙編」這一類的書裏，幾乎全都列有下列的這一條。

——銀行家是在天晴時硬把雨傘借給你，而在下雨時收回的人。

有的書上，在句子的末尾註着佚名，有的註明「英諺」，只有一部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出版的「名言彙編」裏，標明這句「英諺」的作者是 Amoy Ku（廈門辜），也就是辜鴻銘。

這位怪儒辜鴻銘生于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年），卒於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年），享壽七十二歲。盛傳有一年，他攜家帶眷地回廈門家鄉小住，同船的一位外國老太太，久仰辜先生的大名，於是一臉傾慕之色，向他討教問題：

「請您給我一點意見好嗎？我這回是到廈門去養病的，請問您，廈門是不是最適宜養病的地方？」

辜鴻銘很誠懇地回答她說：

「適宜之至，想當初，我剛到廈門的時候，情況可嚴重得很呢！別說連一句話都不會說，一步路都不會走，而且隨地拉屎撒尿的，成大躺在床上，簡直糟透了……」

老太太高興得什麼似的，手舞足蹈，笑逐顏開的說：

「那地方如此神妙，怪不得醫生會建議我到廈門去養病，太好了！太好了！辜先生，請問您在廈門住了多久呀？」

辜鴻銘的答覆却是突梯滑稽的一句。

「我是誕生在廈門的！」

「……」

事實上，這又是許多詼諧之士所製造的「辜式」笑料之一。因為，辜鴻銘的誕生之地是馬來亞的檳榔嶼，並非廈門，而他的英文名字亦非廈門辜或辜廈門（Amoy Ku），辜鴻銘一生用過兩個英文名字。。Koh Hung-beng，一望而知，是閩南語發音的辜鴻銘。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他擔任一個英國探險隊的譯員，抵達廣州，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開始在張之洞的幕府工作，方才改以藍青官話的發音。Ku Hung-Ming。

辜鴻銘的身世，充份具有傳奇浪漫的色彩，他的祖先是移居馬來最古老的華僑之一，旅居馬來的時間要比英國人更早。

關於中國人最初到達馬來的經過，「馬來紀年」一書上會有一段自說自話式的記載，既幼稚而又有趣，據說：當印度國王拉惹蘇蘭 Raja Suran 執政時期，東西各國「咸表臣服」，唯有中國「不臣」，拉惹蘇蘭便集合了各國之師一億零二十餘萬人，東來攻打中國，「所向披靡」，連克吡叻、柔佛、單馬錫。中國國王聞訊「大起恐慌」，向羣臣問計「如何抵禦」？

便有一位賢臣說是「臣有一計，必可退敵」。

中國國王採納了他的計策，於是這位賢臣就備下一艘巨船，在巨船上植樹數株，載了些牙齒脫落的老者，

生了銹的鐵針，駛向單馬錫去。印度王聽說有中國船到了，下令召見矯裝船主的中國賢臣，問他從單馬錫到中國路程究竟有多遠，中國賢臣答道。

「從單馬錫到中國，究竟有多遠，一時委實說不上來。不過，我們自中國啓程來此時，都在少年，此刻抵達單馬錫却已齒落年邁了。還有船上的這幾株大樹，記得還是我們臨啓碇時下的種子，如今已經樹大數圍。至於這些生銹的鐵針，原是船上所有的鐵杵，現在竟腐爛銹蝕到這種程度，國王從我們航行的時間上推算，當不難獲知由單馬錫到中國的距離了。」

印度拉惹蘇蘭王一聽，不禁大哭一驚，他當天就下令班師回印度了。

曾祖曾是檳城之王

單馬錫，又名談馬錫，英文原名是 *Tamasik*，也就是新加坡。據歷史記載，首先到達新加坡而又叫得出名字來的中國人，是辜鴻銘的伯父辜國材，和一名工役曹亞志，清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一月二十八日，他們隨同英國萊佛士爵士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在新加坡登陸，會晤當地的天猛公 *Temengong*，也就是現今柔佛蘇丹的祖先。萊佛士用三千元的年金，換取天猛公允許英國人留居島上，開設工廠，以及不再許其他國家移民，或與之發生任何關係的承諾，二月六日，萊佛士率領東印度公司的六艘船艦駛入新加坡，在海濱豎立一支旗杆，由曹亞志升起一面英國國旗。當萊佛士一行抵達新加坡之前的數百年間，新加坡只有少數漁民居住，一云一百五十人，一云五百，尙且還是海盜的淵藪。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新加坡、檳榔嶼和馬六甲三地，合組為英國另一殖民地，首邑設在檳榔嶼。

突梯滑稽辜鴻銘



辜鴻銘一生不穿西裝，圖為其晚年時留影。

但是，早在萊佛士抵達新加坡，使馬來成爲英國殖民地的三十三年以前，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七月十八日英國船長賴特(Light)所指揮的東印度公司先遣隊，首度駛進檳榔嶼，在比那加角(Point Pennager)登陸，第二天，便有辜鴻銘的曾祖父辜禮歡，帶了幾名印度基督教徒，從吉打州拉烏得(Kuala Muda, Kedeh)趕了來，向遠來之「客」致意，送給賴特一條漁網，贏得賴特衷心的感激。因此，同年八月十一日賴特捲土重來，將檳榔嶼加以佔據，改名「威爾斯王子島」，在檳榔嶼設立「甲必丹」Captain，負責檳榔嶼的行政工作，他所委任的第一任檳榔嶼首領便是辜禮歡。時至如今，還留有一份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七）五月七日賴特致印度孟加拉東印度公司的函件，賴特爲此特地提出報告說：

「在威爾斯王子島，本人經已委任最可尊敬之華人辜禮歡爲首領（Captain）。」

無可否認，辜禮歡早即爲檳榔嶼土著一致擁戴的領袖，他在身爲甲必丹以前，係以捕魚爲業。和賴特締交之後，不久他便改而經商，兼事墾殖。因爲，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辜禮歡便從賴特那兒獲得一筆東印度公司的開發貸款，並且在東印度公司的

十八日英國船長賴特(Light)所指揮的東印度公司先遣隊，首度駛進檳榔嶼，在比那加角(Point Pennager)登陸，第二天，便有辜鴻銘的曾祖父辜禮歡，帶了幾名印度基督教徒，從吉打州拉烏得(Kuala Muda, Kedeh)趕了來，向遠來之「客」致意，送給賴特一條漁網，贏得賴特衷心的感激。因此，同年八月十一日賴特捲土重來，將檳榔嶼加以佔據，改名「威爾斯王子島」，在檳榔嶼設立「甲必丹」Captain，負責檳榔嶼的行政工作，他所委任的第一任檳榔嶼首領便是辜禮歡。時至如今，還留有一份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七）五月七日賴特致印度孟加拉東印度公司的函件，賴特爲此特地提出報告說：

「在威爾斯王子島，本人經已委任最可尊敬之華人辜禮歡爲首領（Captain）。」

無可否認，辜禮歡早即爲檳榔嶼土著一致擁戴的領袖，他在身爲甲必丹以前，係以捕魚爲業。和賴特締交之後，不久他便改而經商，兼事墾殖。因爲，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辜禮歡便從賴特那兒獲得一筆東印度公司的開發貸款，並且在東印度公司的

指導協助之下，由蘇門答臘島北端的亞齊（Atjeh）首度輸入胡椒種籽，在檳榔嶼開闢胡椒園，由而致富。同時，他又經由投標獲得承包兩處市鎮的酒稅。益以他的地位、聲望和財富與日俱增，使他成為威爾斯王子島公路委員會唯一的非英國籍的委員。

根據黃存榮所著，新加坡國家語文局刊行的「華籍甲必丹」一書記載，檳榔嶼的這一位領袖人物辜禮歡係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逝世，他遺留下八子三女，其中大都卓有成就。

辜禮歡的八個兒子之中，有好幾位獲得比他本人更好的機會，很早就在政壇商場嶄露頭角，步上光明遠大的前程。例如辜國材，他曾是東印度公司要角萊佛士爵士的得力助手，一八一九年萊佛士率領船艦登陸新加坡，辜國財即為隨員之一，他曾協助萊佛士，在新加坡開闢草萊，大興建設，宣佈新加坡為自由港，而在短暫的半年之間，使漁民、海盜總人口不過一百五十到五百的新加坡居留人數激增到一萬以上，而且第二年的貿易額，即遠超過荷蘭人經營多年的馬六甲。又如被辜禮歡遣返國內就讀的辜安平，他曾經中過進士，在林則徐的部下為官，還曾調到台灣來任職，辜安平後來便在台灣定居，黃存榮的「華籍甲必丹」一書甚至指明了說：

「（辜安平）其子孫少數留在大陸外，餘者皆隨他同往台灣。他的三位孫子辜賢榮（應為辜顯榮）在台灣從商，事業發達，社會地位亦高。……台灣於一八九五年正式割讓於日本，賢榮（顯榮）在日本政權底下，聲譽極高，終因服務有功，被日本封為貴族。」

跟辜顯榮是堂兄弟

照他的說法，那麼，辜安平之孫辜顯榮，和辜龍池（辜安平之弟）的孫子辜鴻銘，就該是堂兄弟了。然則

，日文「辜顯榮傳」卷首却謂辜顯榮的原籍係在福建泉州，其第十三世祖辜仁發約在康熙初年移居台灣鹿港，跟黃存榮的說法截然不同。祇不過，辜顯榮祖籍福建泉州，辜鴻銘的祖先係自福建同安遷往馬來半島的，同安在明清兩代都隸屬泉州府，同時在日文「辜顯榮傳」一二四頁，有「同族之先賢辜鴻銘博士」的記述，二二一頁又刊有一幀辜鴻銘贈予辜顯榮的照片，上款題着辜顯榮的號・「耀星宗弟」，下款署「辛酉十二月湯生題贈」，時年六十有五」，「湯生」是辜鴻銘的名字，辛酉歲在民國十年，而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二月四日，辜鴻銘在日本講學期間，辜顯榮曾邀他到台灣講述孔子學說，可見兩人交往頗為密切。據說日本「辜顯榮傳」所載的辜氏遷台始祖並無族譜根據，僅係傳說而已。所以，黃存榮的說法除了「賢」「顯」二字之誤以外，依然可資採信。準此，則辜顯榮之子辜振甫，當係辜鴻銘的姪輩。

辜鴻銘的祖父辜龍池，在辜氏遷往馬來的老家吉打州任公職，他的工作成績相當優異，於地方建設卓著功勳。辜龍池之子辜紫雲，也就是辜鴻銘的父親，則擔任檳榔嶼雙溪呂蒙（Sungei Nibong）牛汝莪橡膠園（Gugor Estte）的司理，他爲人忠厚勤勉，誠懇負責，極獲橡膠園主英國人布朗（Forbes Scott Brown）的信任，布朗和辜紫雲兩家關係非常親密，以致辜紫雲將他的次子辜鴻銘報在布朗夫婦的名下，成爲他們的養子。當辜鴻銘十歲那年，布朗就將牛汝莪橡膠園交給辜紫雲代爲經營，舉家遷返蘇格蘭老家去。

布朗回國之初，先已徵得辜家的同意，把辜鴻銘帶到英國去唸書。他辭別父母，遠涉重洋，到蘇格蘭後便和布朗家族同住，同時進入當地英國學校，開始接受英國式的教育。直到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他以優等成績，通過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修辭學各科考試，榮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使他成爲我國最早完成全部英國式教育的唯一一人，而且，在這一年上，辜鴻銘不過實足年齡二十歲，

因為他是咸豐七年（一八五七）誕生於檳榔嶼的。

二十歲獲得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猶未能滿足辜鴻銘的求知欲，當年他便離別義父義母，獨自一人到德國，入來比錫大學，習土木工程。學成以後，再赴巴黎，一住數月，專攻法文。到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時，二十三歲的辜鴻銘，不但兼具英國文學與土木工程雙重學位，尤且精通中國、馬來、德、英、法、拉丁、希臘七種語文，他由歐洲返抵檳榔嶼，奉派在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擔任公職。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像辜鴻銘這種博學多藝的人才，在全中國實不作第二人想。可惜的是，當中國最需要新人才之際，辜鴻銘却「維楚有才，晉實用之」，在新加坡充任一名小公務員。

事有湊巧，就在辜鴻銘在新加坡任職初期，江蘇丹徒人馬建忠，自法國學成返國，道經新加坡，住在海濱旅社。辜鴻銘在旅居巴黎時，即曾耳聞馬建忠的大名，因此慕名前往拜訪，一談就是一整天，詎料就由於這一日長談，使辜鴻銘整個改變了他的人生路向。

馬建忠使他大轉變

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鎮江）人。曾國藩、李鴻章幕府要員、淮軍糧台馬建勛是他大哥。中國第一位神學博士，司鐸，往後中華民國的中興人瑞，百歲老人馬相伯（良）是他的三胞兄。馬建忠本人自幼在徐匯公學攻讀，學成後是李鴻章的心腹股肱，光緒二年（一八七七），清廷派遣學生出洋，馬建忠以郎中銜派赴中國駐法使館，學習洋務，他很容易的進入巴黎大學，三年後，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服務。他雖然是一名洋博士，但却由於家學淵源，他二哥馬相伯在徐匯公學就讀時期，便一面求學一面教授經史，所以馬建忠既精通法律

，留心經世之務，又復是國學權威。他在法國留學時就著有「鐵道論」、「借債以開鐵道說」，返國後又編撰「馬氏文通」、「適可齋記言」、「適可齋記引」等書。和辜鴻銘的全盤接受西洋文化，對於祖國文化僅獲得其皮毛者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尤其馬建忠一門三傑，深受中國當軸李鴻章的倚重，前程如錦，自在意料之中。

因此，當馬建忠接見辜鴻銘，接席懇談，娓娓不倦。他對博大精深的祖國文化，多方誘導辜鴻銘窺其門徑，直聽得辜鴻銘悠然神往，不勝仰慕。同時，馬建忠又指出祖國正在祈求進步，迎頭趕上西洋列強時期，對於新學人才，迫切需要。像辜鴻銘這種精通洋務的人物，在國內猶如鳳毛麟角，稀世之珍。他竭力勸促辜鴻銘，與其楚才晉用，何不楚弓楚得？將自己的所學貢獻給苦難中的國家與同胞。「血濃於水」，馬建忠的一席懇談，使辜鴻銘深受感動，他立即以行動表示決心，聆悉馬建忠名言讖論三天後，辜鴻銘便向新加坡輔政司辭職，回到檳榔嶼家中，脫下西裝革履，穿上長袍馬褂，從此不再自嘲的說自己是「假洋人」了。辜鴻銘開始說中國話，吃中國飯，重理線裝書，潛心經史，他下定決心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做一個澈頭澈尾，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在檳榔嶼住了一年多，鑽研中國舊籍，突飛猛晉，進步神速。光緒七八年之交，有一個英國探險隊，準備進入中國，轉赴緬甸曼德勒，作一次長程旅行，需要僱用一名中國翻譯。辜鴻銘爲了便於重回祖國懷抱，游歷華南山川，不惜屈就。他跟着這個探險隊到廣州，轉赴雲南，正待穿越滇緬邊境，却又發現滇緬之間道路險阻，危機四伏，辜鴻銘志不在搜奇歷險，因此他便畏難而止步，辭職不幹了，從雲南折回香港，一住便是三四年，繼續埋頭苦讀中國典籍，在這一段期間，他已能升堂入室，窺其奧妙，恍然有所憬悟，清史列傳「辜湯生傳」，形容他進德修業之猛，曾有如下的一段妙文：

「幼學於英國，爲博士，遍遊德法意奧諸邦，通其政藝。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國學術，窮四子五經之奧，兼涉羣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譯四子書，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西人見之，始歎中國學理之精，乃爭起傳譯。……」

誠然，辜鴻銘對於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最大貢獻，不在於向國內輸入西洋文化，而係專向西方譯介中國典籍，以使西方人士對中國此一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傳統有所認識。辜鴻銘首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印行英譯本的論語，復於六年後（一九〇四）將他譯述的「中庸」發交日本郵報逐日連載，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刊印單行本，又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刊行英文本的「春秋名分大義」，一名「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就辜氏一生而言，這是一本相當重要的著作，全書共分八篇，是為：一、中國人的精神，二、中國的女人，三、中國語文，四、約翰史密斯在中國，五、一位偉大的漢學家。六與七，所謂中國研究，八、附錄。

一壺四杯四輪一筒

由於「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正好問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辜鴻銘乃於第八篇附錄之中指出德國人的鐵血至上，迷信權力，以及英國人的侈談民主，議會政治又被盲目羣衆所把持，因而導致亂政。這兩股逆流業已取代耶穌基督「信、望、愛」，犧牲自我博愛世人的傳統，使宗教無復再爲道德力量有以約束人心，所以才會導致世界大戰的空前慘禍。辜鴻銘在他的結論中明確指出，如須消除戰禍挽救世人，唯一的途徑在於闡揚中國孔子的學說。——這一項結論，即使應用於當前的紊亂世局，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辜鴻銘在第一篇中說明：中國人的根本是性善，從小就接受孝與忠的教育，並且認為孝與忠是天賦的責任，他說孔子在這一方面頗多闡釋。孔子的思想價值不但可以取代宗教觀念，尚且還在宗教觀念之上，這便是中國人尊重孔子的原因所在。

第二篇「中國的女人」，辜鴻銘的觀點和論調，多年以來始終為全球各地人士樂為談助，因為他稱譽中國婦女的自我犧牲精神允稱舉世楷模，他讚美中國婚禮的隆重，強調丈夫之與妻妾，跟他對妻子的愛情無關。原來辜鴻銘是並不反對納妾的，儘管有很多人對他的說法不以為然，紛起和他辯論，然而辜鴻銘的理由却堂而皇之，說：

「如果一個男人只能有一個妻子，那麼，何以一隻茶壺要配四個杯子呢？」

某次，在一個宴會席上，有一位德國籍的貴夫人，當眾質問辜鴻銘：

「既然男人可以多納妾，那麼女人也就可以多招夫嘍！」

辜鴻銘却連連搖頭的答道：

「那怎麼可以？不但於情不合，於事、於理皆有所違。請問夫人，您府上是自備黃包車呢？還是自備汽車？」

「汽車。」那位德國夫人，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只好據實回答。

「汽車有四隻輪胎，請問，府上準備了幾付打汽筒？」辜鴻銘的話還沒有說完，席上的男女人等，早已笑得東倒西歪，前仰後合。

可想而知的一項事實，是辜鴻銘本人也在享齊人之福，他的元配夫人是一位標準典型的中國婦女，三十金

蓮長不及掌。妾侍則是如花似玉的日本姑娘。辜鴻銘沒有她們，幾乎無法渡日，他常和朋友開玩笑的說。

「淑姑是我的興奮劑；蓉子是我的安眠藥。」

淑姑是他的正室，據辜鴻銘的老家人說。辜夫人不在辜鴻銘身旁時，他是一個字都寫不出來的。所以每逢辜氏握管，必須辜夫人隨侍在側。辜鴻銘猶有一項舉世聞名的怪癖，他寫文章時右手握管，左手捏「佛手」，邊喚邊寫，「佛手」在握，「揮毫落紙如雲煙」，靈驗無比。然而他所喚的「佛手」，正是辜夫人盈盈一握的三寸金蓮。

辜鴻銘的東洋小老婆，芳名「蓉子」。辜氏一夜無伊，便無法入眠。據說有一天，雙方鬧起了彆扭來，二夫人說什麼也不理他，接連三宵不搭腔，辜鴻銘就此失眠三夜，兩眼佈滿紅絲，二夫人還是不和他說話。辜鴻銘百無聊賴，於是一竿在手，獨坐蓉子窗前垂釣解悶。這一下，二夫人可着急了，——金魚缸裏的金魚，正是她的寵物，那能容人垂釣？顧不得還在賭氣，終於先開了口。

「冤家呀，你怎麼在我金魚缸裏釣魚呢？」

辜鴻銘哈哈大笑，只要蓉子肯開口，不再生他的氣，那就萬事皆休。當下他笑嘻嘻地說：

「好人兒，我那敢釣你的魚呢，我只不過想把蚯蚓淹死罷了。」

嬌妻美妾調和功夫

辜鴻銘的閨房之樂，着實比張敞畫眉勝過多多。有此嬌妻美妾，和他本人過人一等的調和功夫，難怪辜鴻銘主張妻妾並存論了。不過，刻在台灣與其夫人白首偕老，恩愛不減當年的林語堂博士，却對辜氏的論調大不

贊同，他會引用「金瓶梅」說部裏潘金蓮的話：「那有一隻碗裏放了兩把調羹，還不衝撞的麼？」對辜鴻銘的說法加以反駁，傳為一時佳話。

第五篇是「一位偉大的漢學家」，係針對英國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而發，當然，在辜鴻銘的原意還是對事不對人的。因為他反對用生吞活剝，照本宣科的方式傳譯中國典籍，逐字逐句的逐譯，或者僅祇摘錄片段，東拼西湊而成書，決無可能發掘其豐富的內涵，與整體的思想，他會說：

「至於等而下之其餘，如所謂中國研究，更不值識者一笑。」

因此，辜鴻銘自己所譯著的幾本書，都曾痛下功夫，而且極有價值，他不但對於中國經典有深切的瞭解，獨到的體認，尤其基於他西洋文學造詣之深，他可以隨時引用西洋名著，參考對證，或者作為註釋，使西方人士讀英文本的中國經典格外容易接受。關於辜鴻銘在這方面的多所致力，成就斐然，本文限於篇幅，不克舉例說明。不過，我們可以從他所譯「中庸」、「論語」兩書的書名上看得出來。辜鴻銘的「中庸」英譯本，書名是 The Conduct of Life——「一生的行為」。「論語」英譯本則名之為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孔子的講學與格言，一部特別的譯文，引用歌德及其它作家舉例說明。」

辜鴻銘的這幾部別出心裁，廣徵博引的心血結晶，使他在國際間享有盛譽，歷久不衰。他廣泛而有效的傳播了中國文化，使西方人士得以接觸東方文化的精髓。辜鴻銘做這一種看似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其意義誠然無比重大，其影響尤將無窮深遠，而西洋人士終能發現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們永遠是「入超者」。誠如辜鴻銘那一段詞簡意賅的中西文化比較觀，他曾在「義利辨」那一篇重要論文中說：

「今夫新學也，自由也，進步也，西人所欲輸入吾國者，皆戰爭之原也。我國之文明與歐洲之文明異。歐洲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利而後義，中國之文明及學說在使人先義而後利。孟子曰：『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鑒。』列強以競利之故，互相吞噬，窮極其殘暴不仁之武力。」

他在同一篇文章裏，又曾以醍醐灌頂之勢，喚醒唯利是圖的列強說：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竊謂以小人之道謀國，雖強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國，雖弱不亡。我國此時欲決大計定大猷（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我國參戰問題），必先審將為君子之國乎？抑將為小人之國乎？誠欲為君子之國，則當勤修內政，加意人才，登上俊良，廓清積弊，使一切措施釐然當於人心，在朝在野人人知禮讓而重道德，對於外交一衷於義之至當，而無所偏袒。」

還有一段話是足以為當今日本首相田中媚共者流引為炯戒的那便是他在五十七年前所說的：

「不此之務，而溺惑於貪利小人之言，冒恥詭隨，妄希戰後權不我操之利，斯益去亡不遠矣！」

辜鴻銘的論著譯述，使歐美日本許多多著名的學者，都很崇拜他的思想。德國有位研究歌德哲學的奈爾遜教授，經常介紹他的學生們研究他的作品，尤其推崇他的三部書——

一、哀訴之音。

二、中國人的精神。

三、中國對歐洲思想之抵抗。

奈爾遜教授曾在倫敦泰晤士報上，讀了辜鴻銘一篇文章，敘述他在北京居住時的感受，憂國憂時的情懷洋溢文中，眼見北京貧民比比皆是，而自己又無力接濟，政府亦一籌莫展，精神上的痛苦，難以言喻，日日祈禱

早日歸天，以求解脫……。使奈爾遜閱後大為感動，特地籌了筆錢，以辜鴻銘在德國所收的「版稅」為名，給他匯了去。

折服於辜鴻銘的學者，不僅奈教授一人，許多在國外研究哲學的教授，都非常推崇他，這不是偶然的，如果說歐洲人純粹是為了「玩古董」的心理，而欣賞辜鴻銘的話，這是不公平的說法，因為中國古董性的學者為數不少，為什麼唯獨景仰辜鴻銘呢？

張之洞幕府二十年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辜鴻銘由於張之洞幕客楊汝澍的推介，受知於時任兩廣總督的河北南皮張之洞，成為他的幕客之一，擔任口頭及文字逐譯工作，他在張之洞的幕府一幹便是二十年，為了替張之洞採擷新知，洞悉世局，辜鴻銘訂了三十餘份外國報紙，五百餘種各國雜誌。張之洞的一位心腹親信，得力助手梁鼎芬，頗訝然於辜鴻銘那能讀得了這麼許多報刊。有一次他求謁張之洞，久久不見張之洞出來接見，梁鼎芬便躡手躡腳入內，從書房窗口往裏一瞧，但見張之洞正襟危坐，凝神睇聽。辜鴻銘則在滔滔不絕，條分縷析，為張之洞剖析世局，縱談因應之道。居然連續的談了兩三個小時，連在窗外竊聽的梁鼎芬都忘其所以，駐足傾聽到底了。從此梁鼎芬由衷欽佩辜鴻銘的博學多才，見聞廣博。而張之洞對辜氏更有「鴻銘精論滿腹，的是傑出之才」的稱譽。

二十年不是一段短暫的時間，一般說來，張之洞、辜鴻銘賓主相處甚歡。祇不過，辜鴻銘也會坦白承認：「余隨張文襄（張之洞死後謚文襄）幕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見聽。」甚至他還說過：「張文襄嘗對客論余，

曰某知經而不知權。」然而，在辜鴻銘的看法却是「張文襄知『術』而不知權」了。他說：

「竊謂用理得其正爲權，不得其正爲術。若張文襄之所謂權，是乃術。……甲申（中法戰爭）以後，文襄有鑒於此（謂忠信篤敬不敵巨艦大砲），遂欲舍理而言勢。然舍理而言勢則入於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於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策，曰爲國則舍理而言勢，爲人則舍勢而言理。」

但是賓主之間畢竟也有相同的觀點，例如張之洞同意辜鴻銘中西史事比較觀的結論：「西洋各國近日政治外強而實彌亂。」以及「近日中國士人不知西洋亂政所由來，好論時事，開報館，倡立議院。湯生竊謂此非盛事，至於時務報載有君權太重之論，尤駭人聽聞。」此外，如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所刊行的「勸學說」，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便也曾採納了辜氏不少的意見。

每逢必要的時候，辜鴻銘尤能投稿西文報章雜誌，用最優美嫋熟的英文，發表中國人的觀點和意見，自國際輿論着手，發揮莫大的效用。諸如張之洞總督湖廣時期，教案迭起，辜鴻銘便在字林西報對傳教士的各項公開企圖加以指責，復經倫敦泰晤士報摘要刊登並加評論，庚子（一九〇〇）拳亂，八國聯軍之役，又以一系列的專論送交日本郵報發表，指摘各國措施之不當，籲請運用智慧、道德、公正處理這個問題。當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將在我國東北開戰，他又撰文刊登在日本郵報，將日俄之戰歸咎於八國聯軍出兵東北亞政策之錯誤，對於中日兩國徒知使用武力。

庚子八國聯軍之役，直接導致辛丑（一九〇一）條約的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中有一款：黃浦江濬修計劃限期完成。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黃浦江濬治局在上海成立，當時辜鴻銘在張之洞的幕府已經耽了整整二十年。張之洞便挑他個好差使幹幹，保舉他當上了督辦。在職三年，圓滿完成任務，也讓他過了三年心情寬鬆，

生活優裕的好日子。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工作達成，機構撤銷。辜鴻銘調任外務部員外郎，他認為這是他書生報國的大好機會來到了，以他回國二十來年的觀察與認識，應詔條陳時事，一針見血、痛切陳詞的揭發了清末的時弊，其中不乏足為後世炯戒的警闢之語，現在且簡述其要點，俾供中外讀者參考。

一、中國士大夫不知西洋亂政之所由來，徒然慕其奢靡，以致朝野一致倡言行西法，興新政，一國若狂。

二、政治之所以不得其平，不患無新法，而患不守法。

三、朝廷行內政則不守舊法，辦外交又無定章可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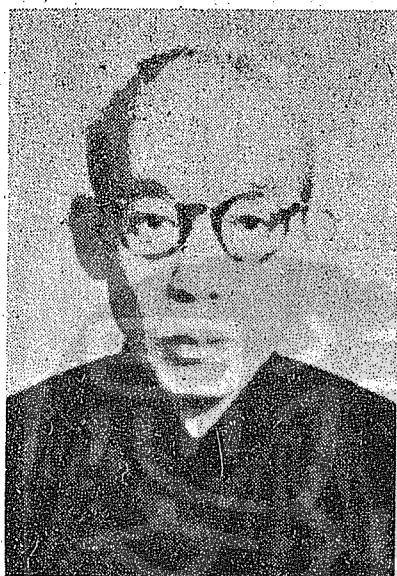
四、自太平軍興，湘軍轉戰各省，清廷許曾國藩便宜行事，因而形成內輕外重之局。

五、李鴻章繼曾國藩而起，品學行誼不如曾國藩純粹，北洋權勢幾與日本幕府專政不相上下，言洋務者，中外咸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

六、北洋既敗（按指甲午中日之戰，北洋海軍陸軍幾乎全軍盡墨），各省督撫爭相辦理洋務，度支部不敢過問開支，戶部不知何人聲勢顯赫。人人各循私意，上下綱紀廢弛，所以庶政不修，民生日艱，國勢遂每下愈況，漸趨阽危。

與辜鴻銘同在張之洞幕府的武昌知府，兩湖書院山長梁鼎芬。

當面教訓了袁世凱



辜鴻銘對症下藥，提出「解救方案」，他用「申明成憲」四字提綱絜領，發表了他的救亡圖存主張，辜鴻銘向清廷建議下列各點：

一、自軍機大臣以至久於任所而有學識的地方官員，會同澈底研究，據實訂定各項法令。務使所有法令不致重複，簡易可行。然後分別綱目，印行善本，頒佈天下一體遵遵。

二、辦理外交應先統籌全局，尤須確立「修邦交」重於「講武備」的決策。

三、「甲午（中日之戰）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以來，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爲國雪恥，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籌餉練兵爲急務」，辜鴻銘直率指出此種觀念應予革除。理由是：「此猶非計之得者」，——「蓋彼臥薪嘗胆之論，猶是當年戰國列邦之陋習。」換言之，辜氏還是主張以理制勢的。

辜鴻銘這一次應詔條陳國事，可以說是他一生之中，唯一一次提出他的政治主張，羅振玉曾盛讚他是「探索根元，洞見癥結。……賈長沙復生不能過是。蓋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藥石。」然而，當年辜鴻銘人微言輕，清廷正值雙重國喪，——光緒、慈禧相繼而死，沒有人對辜鴻銘的意見予以重視。

轉眼間又到了宣統元年（一九一〇），就在陰曆十二月初七，陽曆一月十七日的那一天，忠心耿耿，誓保皇室的辜鴻銘，總算是獲得了清廷頒授的一項榮典，他以「游學專門列入一等」的資格，由宣統兒皇帝賞給文科進士。和他同榜的文科進士還有嚴復和他的學生伍光建，名次是嚴復居榜首，辜鴻銘第二，伍光建第三。文科進士之外還有工科進士詹天佑和魏瀚。辜鴻銘終於成爲福建泉州同安辜家，繼辜安平之後的第二位，其實也是末代進士了。可是他對於獲此恩賞榮銜似乎還不大滿意，因爲他夾在嚴幾道（復）、伍光建兩師徒之間，這兩師徒都是靠譯述西洋名著而成名的，把西洋名著譯給中國人看，因而名利雙收，備受重視。將中國典籍傳播到國

外，使歐西人士一致禮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反倒不爲國人所知。本末倒置，使辜鴻銘難免有厚此薄彼之歎，所以他曾發過：「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反覆詞費，何遂矜獲創焉。」（末一句話，係採自韓愈讀東方朔雜事詩：「方朔不懲創，挾恩矜夸。」）辜鴻銘對嚴復、伍光建兩師徒，乾脆以東方朔自居，表示他肚大量大，嚴伍則是托天僥倖，挾恩矜夸了，於焉也可以認知他是何等的自許。

本來，在這一段時期裏，辜鴻銘心情相當惡劣。因爲，他相隨二十年的老東家：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管理學事部務、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太子太保，實錄館總裁官張之洞，先於宣統元年陰曆八月二十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五歲。辜鴻銘榮獲文科第二名進士的那一天，張之洞已經死了三個多月，故東情深，感舊憶往。辜鴻銘正悶悶悒悒的從事寫作，他一口氣連寫兩本書，一本是「張文襄公（之洞）幕府紀聞」另一本則爲用英文寫成的：「中國人的牛津運動」，原書名是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前者係一部對於遜清同光人物頗多非議批評，嘻笑怒罵的記述，例如他曾直斥袁世凱：「人謂袁世凱爲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是賤種也。」袁世凱也拿他無可奈何。光緒三十三年，張之洞入軍機，自武昌晉京，途經保定。袁世凱正在直隸總督保定任所，他對張之洞這位前輩迎送如儀，盛宴款待，張之洞偏就倚老賣老，在盛大宴會上伏案呼呼大睡，使少年得志的袁世凱奇窘無比，又有他的幕客辜鴻銘，眼見袁世凱派兵在張之洞的旅邸擔任警衛，他當面教訓袁世凱說：

「宮保（按指袁世凱）盛陳兵衛，係以國家之兵交歡同寅，則兵將知有宮保而不知有國家。一旦疆場有事，將士各爲其領兵統帥，臨陣必至彼此不相顧救。如此雖步伐齊整，號令嚴明，器械嫻熟，亦無以制勝。……中國未經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義正詞嚴，光明正大，教訓得袁世凱無詞以對，唯有諾諾謝罪。

張之洞·辜鴻銘這賓主二位的一趟保定行，委實把一代梟雄，目無餘子的袁世凱給袁宮保整慘了。

大喬小喬太監把式

清末大吏之中，袁世凱的不學有術是出了名的，他連秀才都沒中過，全憑巧取豪奪的政治手腕，飛黃騰達，位至各省督撫領袖，內閣總理大臣。因此不論他地位多高，仍舊被人瞧不起，曾有一次，袁世凱又受了氣，他憤憤然的向人說：

「南皮（按指張之洞）動輒就講學問，我是個沒有學問的。然而，這些年來，我不是也辦了不少的事嗎？」

這話傳到辜鴻銘的耳裏，他哈哈大笑的說：

「誠然，但却要看所辦的是何等事？譬如老媽子倒馬桶用不著學問。除了倒馬桶之外，我不知道天下還有何事，是沒有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

辜鴻銘把袁世凱看得一文不值，對郵傳部尙書盛宣懷也不屑一顧。有一年，他到上海謁見盛宣懷，盛宣懷聽說他所翻譯的「中庸」已經出版了，於是向他索取一本，盛宣懷說：

「中庸一書，乃是有大經濟之書，乞君檢送一本，爲子輩讀。」

辜鴻銘却不动聲色地反問：

「中庸一部要旨，宮保謂當在何句？」

宮保不知如何以對，於是反覆的問：

「君意云何？君意云何？」

辜鴻銘回答他說：

「賤貨貴德。」

盛宣懷受了他的譏諷，只有顧左右而言他，把尷尬場面掩飾過去。

「張文襄幕府記聞」一書中也有嚴肅的一面，但却出之以風趣幽默的筆調。辜鴻銘曾以寥寥數語，寫盡了清末中國面臨大變前夕的惶惶無主情狀，他說：

「竊謂中國自咸同以來，經粵匪（按指太平軍之役）擾亂，內虛外威，紛至迭乘，如一叢病之軀，幾難着手。當時得一時髦郎中湘鄉曾姓者（按指曾國藩），擬方名曰：『洋務清火湯』，服若干劑，未效。至甲午，症大變，有儒醫南皮張姓者（按指張之洞）又擬方名『新政補元湯』，性燥烈，服之恐中變，因就原方略刪減，名曰『憲政和平調胃湯』。自服此劑後，非特未見轉機，而病乃益將加劇焉。勢至今日，恐殆非別擬良方不可。」

他這一部「張文襄幕府記聞」，曾經由他自己譯成英文，送由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季刊發表。

在清廷外務部備位閑曹，長才無從發揮，辜鴻銘不甘常年投闲置散，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他辭職南下，擔任南洋公學校長，辛亥革命，民國肇建，辜鴻銘依然表示效忠滿清，連腦後那根豚尾都拒絕剪掉，南洋公學校長也不幹了，先住上海，後遷北京，關起大門埋頭著述。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國銀行團聘他擔任翻譯員，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竟至參加辯帥張勳的復辟怪劇，由於武昌督署的老同事梁鼎芬是宣統的老師之一，且爲復辟怪劇要角，辜鴻銘也得了個外務部的差使，可是兒皇帝復辟前後僅歷十二天，便被段祺瑞馬廠誓師一仗

打垮。辜鴻銘兜頭被澆一盆冷水，他漸漸的對滿清朝廷心灰意冷，專心一意的從事教學與著作，應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學研究所主講：「英國詩」。

辜鴻銘晚年在北京大學授課時，也是詠諧百出，不修邊幅，頭戴紅頂瓜皮帽，身穿藍布大褂，拖著腦後一條大辮子，雖然年紀很大，却顯不出老態龍鍾模樣，常常有人把他的老家人劉二誤認爲他，因爲王僕二人年齡相若，裝扮又相似，所以辜氏常常笑著告訴朋友說：

「劉二是我的影子，雖然我們裝扮一樣，可是我們的不同點是我有大喬小喬之好，而劉二却是李蓮英的把式。」

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有妻有妾，而劉二却打了一輩子的光棍。

辜鴻銘和後生晚輩起天來，往往一連數小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若他的話說完了，立刻站起身來，板起面孔請你走路，到那時候却又是不由分說，毫不容情的。

辜鴻銘堅決反對中國文學革命，曾經撰寫專論，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論者將古文列爲死文字。他對白話文的看法，更是令人拍案叫絕，他曾在孔子誕辰紀念日，發表了這麼一首白話詩：

「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後生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研究辜鴻銘俱樂部

辜鴻銘一生雖然游戲人間，可是天性聰敏，也肯上進，才有如此偉大的成就，令人敬佩的是他雖反對帝制，仍有忠君思想，他經常在報上發表維護清朝皇室的文章。在國外仍然留著長辮子，穿著長袍馬褂，出入於交

際場所，因此常常受到革命份子和外國人士的攻擊。

辜鴻銘這個人，爲人處事都順性而爲，隨心所欲，既使連他頭上留的辮子，也是完全出於自己的喜愛，絲毫不帶政治思想色彩，這是他獨特的審美觀。雖然他是保守派，可是他反對帝制也相當的強烈，他曾經在他所著的「讀易草堂全集」裏諷刺過辮子，而他自己的腦壳上，却吊著一根大辮子，而且誓死也不肯剪掉。

復辟的張勳過六十歲的生日時，辜鴻銘曾贈一付集句壽聯給他——

「荷盡已無擎雨蓋；

菊殘尤有傲霜枝。」

所謂「擎雨蓋」就是清代大老爺的官帽；「傲霜枝」則爲俗稱豬尾的那條辮子。

辜鴻銘贊成留辮子，欣賞女人纏足，不反對隨地吐痰，他的怪癖還不止這些，和友人談天，不論生朋熟友，他都來這一套——用中文來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來回答中文之問，把友人捉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每屆除夕，辜鴻銘總要祀祭祖先的，慎終追遠，不敢或忘，即使在英國讀書時也不例外，在自己的房間裏準備酒饌，遙祭祖先。英國房東太太等他叩完頭，祭拜完畢之後，笑嘻嘻揶揄他說：

「你的祖先什麼時候來吃喝你的祭品呢？」

辜鴻銘靈機一動，不慌不忙地回答：

「就在你們祖先來嗅你們所獻鮮花的時候。」

他的英文基礎極好，英文詩寫得更婉約動人。「揚子江流域」一書的作者白特夫人，就很贊賞他的詩，她曾在書中很感慨地說：

「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還沒有出生呢！」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辜鴻銘應日本東方文化學會之聘，到日本去作一系列的學術講演，同年底又被辜顯榮邀來寶島台灣分赴各地講演孔子學說。他在日本住了兩年多，民國十六年返國，仍寓北京，一度當過「安國軍總司令」、「大元帥」，奉系軍要張作霖的顧問，又被「山東督軍」張宗昌內定為山東大學校長，不過尚未及蒞任，便在十七年四月三十日病逝，享年七十二歲。

辜鴻銘接受過完整的西洋教育，但是他却一再的說過：「今吾人習西人之學者多疇子小人。」「願吾子善廣其學而不失其爲正則可矣。」看來頗嫌矛盾，然而他自有他的精闢見解，那便是「我不知西人之學，亦無以知吾周（公）孔（子）之道之大且極矣。故曰學，聞見也，非道也。然非學無以見道，其學愈廣，其見道愈大。」

這就是辜鴻銘一生治學的獨到之處。

因此，不但德國人曾將辜鴻銘的若干作品，加以譯述，尚且組織了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俱樂部，清末民初的中國學人，在海外受到如此推崇尊重的，當以辜鴻銘獨佔鰲頭了。